文物里的岁时风俗

器物证风俗 纹饰寓安康

——从文物管窥端午岁时民俗与古人防疫智慧

魏汉

仲夏五月，时序端阳。端午节作为中国重要传统节日，根植于先民对自然节律的认知与防疫避灾的生活实践。古人以五月为“恶月”，以五日为“恶日”，暑湿蒸腾、毒虫滋生、疫气易起，遂形成焚香祛秽、悬艾挂蒲、驱避五毒等一整套节俗体系，绵延数千年而不绝。安徽阜阳市博物馆收藏的香薰、五毒压胜钱等文物，以器物证风俗，以纹饰寓安康，成为解读皖北地区端午岁时文化以及古人防疫智慧与民俗信仰的珍贵实物载体。

端午之源：恶月恶日与防疫古俗

端午之俗，源于上古，定型于汉，兴盛于唐宋，普及于明清。其核心内涵始终围绕祈福安康、避瘟防疫展开。西汉《大戴礼记·夏小正》载：“五月，蓄兰，为沐浴也。”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载端午采艾悬门、泛菖蒲酒、禳毒气之俗。可见端午节从诞生之初，便与公共卫生、时令保健、驱邪祈福相关，堪称中国古代的“健康节”“防疫节”。

端午文化并非单一传说所能涵盖，而是由天象崇拜、节气养生、民间信仰长期融合而成。熏香、佩饰、辟邪之物，则是这一文化最直观的物质呈现。阜阳地处颍淮腹地，汉至明清文化层积深厚，出土香器与民俗钱币恰好串联一条完整的端午民俗物证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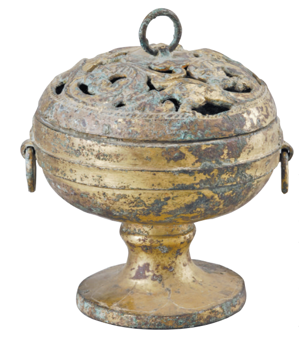


图1 汉代鎏金铜豆式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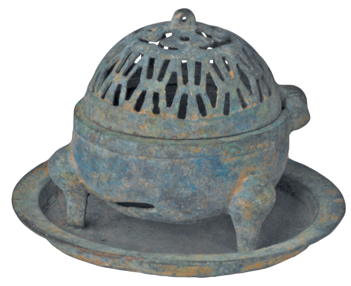


图2 汉代铜带盘鼎式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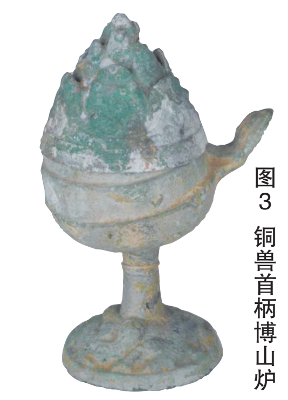


图3 铜兽首柄博山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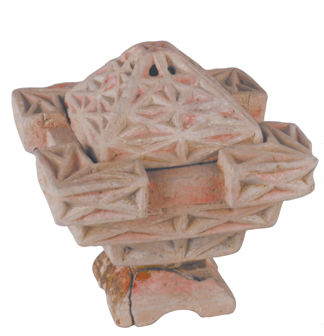


图4 陶质几何纹方形豆式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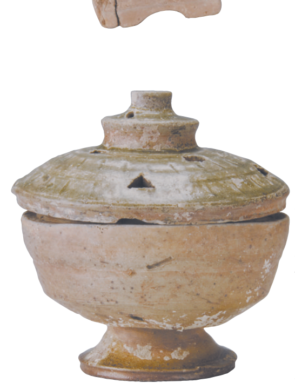


图5 南北朝青釉镂空瓷熏炉

香薰袅袅：汉晋香器与熏香防疫传统

焚香祛秽，是端午节最古老、最稳定的习俗之一。先秦以兰蕙沐浴，汉晋以香薰驱疫，唐宋以香囊随身，明清以艾烟驱虫，一脉相承，皆以“香气正气，以避邪秽”为核心理念。阜阳地区出土的熏炉、香囊等品类丰富，包括鎏金铜豆式炉、铜带盘鼎式炉、铜兽首柄博山炉、陶几何纹方形豆式炉、青釉镂空瓷熏炉等，是古代节日及日常用香习俗的直接物证。

汉代鎏金铜豆式炉（图1），出土于涡阳县稽山崖墓，器表通体鎏金，炉盖透雕螭虎纹样，香气可自孔隙散逸。炉身两侧饰铺首衔环，造型端庄，工艺精湛，为汉代贵族用香之器。炉盖镂空设计专为散香，所焚多为艾、兰、藿香、茅香等芳香本草，契合“香者气之正，正气盛则除邪辟秽”的观念，是端午熏香防疫的典型用器。

汉代铜带盘鼎式炉（图2），由炉盖、鼎式炉身与分体承盘构成，炉盖镂空可散烟出香，腹设铺首衔环、下承三蹄足，搭配承盘可承接香灰，兼具实用性与礼仪性。

铜兽首柄博山炉（图3），炉盖作层叠仙山之形，象征海上神山，香烟自山峦间升腾，兼具祭祀与祛秽之功用。博山炉亦是此用香传统的重要载体。

陶质几何纹方形豆式炉（图4），民间所用造型简朴，盖顶有半透雕几何形镂空，成本低廉、使用普遍，印证汉代颍淮民间已形成端午焚香防疫的生活传统。

南北朝青釉镂空瓷熏炉（图5），器身施青釉，釉色温润，炉体镂空雕饰三角形纹样，兼具实用性与工艺美感，延续了汉晋以来端午焚香辟邪的习俗，也体现出南北朝时期民间用香器具材质多元、工艺精湛的特点。

从贵族鎏金铜炉到民间陶质熏炉，再到南北朝瓷熏炉，阜阳出土香器构成完整序列，实证端午熏香防疫之俗在皖北地区自汉至南北朝一脉相承，是古人顺应节气、重视卫生、预防疾病的智慧结晶。

五毒压胜：明清花钱与端午驱毒辟邪信仰

汉晋南北朝熏香避疫的传统，至明清进一步走向世俗化、符号化，形成驱五毒、佩吉物、镇邪祟的端午民俗体系。民间广为流传的五毒形象为蛇、蝎、蜈蚣、壁虎、蟾蜍，但不同地域会结合谐音、信仰等替换纹样，衍生多种组合样式。时人认为五月端午之时五毒尽出，易伤人致病，故以“以毒攻毒”之理，制作各类辟邪饰物，五毒压胜钱便是最具代表性的节令佩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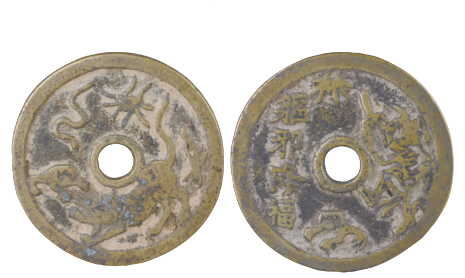


图6 清代“驱邪降福”五毒压胜钱

清代“驱邪降福”五毒压胜钱（图6），黄铜质，圆形圆穿，属不参与流通的民俗钱币，专为端午佩戴祈福之用。钱币正面采用四分区构图：圆穿左侧竖读楷书“驱邪降福”，笔意端严；右侧铸刻钟馗举笏形象，钟馗戴纱帽、着袍靴，执笏板朝天，是民间道教信仰中专司打鬼驱邪、辟邪除灾的神祇；圆穿上方铸有蜘蛛，下方饰三足蟾蜍。蜘蛛古称“蟢子”，古书《新论》载“野人昼见蟢子者，以为有喜乐之瑞”，“蟢”谐音“喜”，故寓意“喜从天降”，与钟馗镇邪、蟾蜍纳福的意象相呼应，整体表达钟馗镇伏五毒、祛邪纳福的祈愿。

钱币背面铸“五毒”图案，顺时针依次排列蜘蛛、蝎子、虎、蟾蜍、蛇。古人认为蜘蛛、蝎子、蟾蜍、蛇皆有剧毒，好在端午时节出没易伤人；而虎为独居动物，“独”谐音“毒”，故常以虎作为“五毒”的象征之一，与其他毒物纹样共同构成“以毒攻毒”的辟邪意象。在明清皖北民间，每逢端午，长辈多为孩童佩戴此类五毒压胜钱，系于衣襟、悬于床头，用以“禳毒气”、预防五毒侵害，与穿五彩丝、佩香囊、戴五毒肚兜等习俗并行不悖。民谚云：“端午节，天气热，五毒醒，不安宁。”佩戴五毒钱，正是以民俗符号化解自然威胁，寄托对孩童健康成长的朴素愿望，是皖北明清端午岁时民俗最直接、最鲜活的文物例证。

器物映岁时：从香薰到压胜钱的端午文脉

从汉晋香器到明清五毒压胜钱，阜阳馆藏文物串联起两千余年皖北端午民俗史，呈现出清晰的文化演进脉络。

汉晋以香薰炉为核心，侧重以香防疫、净化祛秽，源于对自然节气与卫生健康的理性认知，偏于实用与礼仪；明清以五毒压胜钱为代表，侧重以符镇邪、以物祈福，信仰色彩更浓，更贴近民间日常生活与审美趣味。二者时代不同、材质各异、功用有别，却共享同一内核：端午以安康为核心，以防疫辟邪为主题，体现中华民族“顺天时、保健康、求平安”的文化基因。香薰炉是卫生智慧的物化，五毒钱是民俗信仰的凝结，共同构成阜阳地域端午文化的实物谱系，见证传统节日在颍淮大地的传承、融合与发展。

一炉清香，祛千年暑湿疫气；一枚圆钱，载万家平安祈愿。文物无言，文脉有声，透过这些珍贵遗存，我们得以重温古人端午习俗，体会传统节日的生活智慧与文化底蕴。

（作者单位：阜阳市博物馆）

千年角黍 端午风华

——江西德安出土南宋三角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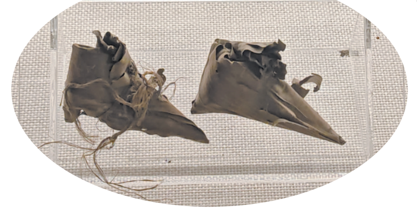
张颖

岁岁端午，粽叶飘香。作为我国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传统岁时节日，端午集祭祀祈福、追思先贤、驱疫健体于一体，承载着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文化基因。在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博物馆，珍藏着一对南宋三角粽，它们是目前现存年代最早的三角粽实物，真实定格了南宋端午的民俗风貌，为研究宋代岁时制度、民间习俗与饮食文化提供了实物佐证。

南宋遗存 千年粽韵

该组南宋三角粽于1988年出土于江西德安县桃园山南宋周氏墓。该墓下葬于南宋咸淳十年（1274年），墓主周氏为南宋新太平州通判吴畴之妻，身份明晰、年代确切。

出土文物共计两件，整体为标准的菱角三角形制，长6厘米、宽3厘米，形制小巧规整，属宋代流行的“一口粽”样式。粽子以天然芦苇叶包裹，采用细麻线紧密捆扎。历经七百余年地下埋藏，文物整体轻微碳化，内部糯米馅料已消解无存，但粽叶轮廓、捆扎纹路完整清晰，包制结构稳定，与当代民间三角粽制作工艺高度吻合。


南宋三角粽

尤为珍贵的是文物出土原生场景：两枚粽子系于一根长40厘米的桃枝之上，桃枝被墓主右手紧握入葬。在传统民俗体系中，桃枝自古为辟邪安魂的祥瑞之物，端午悬桃祈福是自古以来的习俗。古人秉持“事死如事生”的丧葬理念，将端午专属节物随葬，既寄托着亲人的哀思，也让逝者得以尽享岁时节俗，生动反映了宋代端午民俗生活以及丧葬礼仪的时代特征。

溯源寻根 古俗绵延

端午古称端五、端阳、浴兰节，其习俗体系历经数千年积淀而成，融合上古图腾祭祀、仲夏避疫、先贤纪念等多重文化内涵。

古代南方百越族群崇尚龙图腾，于五月初五举行祭祀仪式，以黍米裹叶投入江水、开展龙舟竞渡，祈福禳灾，这便是端午食粽、竞渡习俗的雏形。西晋《风土记》明确记载“以菰叶裹黏米，谓之角黍”，标志着粽子正式成为端午专属节令食物，兼具祭祀与食用双重功能。

宋朝社会经济繁荣，市井文化兴盛，端午发展为全民性岁时佳节，官方放假、民间庆贺，习俗体系愈发完备，时人甚至将端午雅称为“解粽节”。宋代粽子工艺成熟、品类繁多，据《岁时广记》记载，南宋民间已有锥粽、角粽、九子粽等多种形制，馅料丰富、形制精巧，食粽之风蔚然盛行。德安南宋三角粽的出土，以实打实的文物证据，印证了南宋江南地区端午裹粽习俗普及、制作技艺成熟的历史，填补了宋代端午民俗实物研究的空白。

文物品鉴 文脉承载

形制一脉相承，见证文化连续性

三角菱角形制是端午角黍最经典的造型符号，起源于上古祭祀礼俗。七百余年时光更迭，德安南宋三角粽的折叠方式、捆扎技法、整体形制，与当代江西、江南地区的三角粽几乎毫无差异。形制的高度延续，绝非简单的工艺传承，而是中华岁时文化代代相传的直观体现。一枚小小古粽，串联起宋、元、明、清至今的端午民俗脉络，印证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守正赓续的鲜明特质。

节物随葬成俗，尽显宋代人文关怀

桃枝系粽、节物入葬，是宋代独有的民俗文化图景。仲夏五月湿热多病、蚊虫滋生，古人视五月为“恶月”，形成了悬桃、插艾、佩香囊、食角黍的避疫祈福传统。宋代民俗不再局限于世俗庆贺，更延伸至生死礼仪。以端午专属节物随葬，是生者以人间岁时温情告慰逝者，希望逝者于另一个世界依旧能循时节、享安康。这一独特的丧葬习俗，将岁时文化、生死观念、人文关怀融为一体，充分展现了宋代民俗生活面貌。

精工细作缩影，映照南宋市井繁华

小小两枚南宋古粽，亦是宋代江南饮食文化的微观缩影。先民就地取材，选用江南遍地生长的芦苇叶包裹糯米，苇叶清香天然、韧性十足，适配裹粽工艺；以本土苎麻纺线捆扎，坚韧耐用、取材便利，尽显古人顺应自然、因地制宜的生活智慧。

规整的造型、均匀的捆扎、成熟的工艺，说明南宋民间裹粽已经形成标准化技法，粽子不再是粗放的祭祀食物，而是精致的节令美食，侧面反映出南宋江南地区物产丰饶、民生安定、民俗繁荣的社会图景。

岁时赓续 古物新生

从远古祭祀角黍，到宋代全民食粽，再到当代花样创新的端午美食，粽子的形态、馅料不断迭代升级，但端午祈福安康、追思先贤、团圆和睦的文化内核始终未变。

七百载粽香未改，千余年文脉长存。德安南宋三角粽不仅是一件宋代生活遗存，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鲜活见证，让我们得以触摸历史、回望传统，读懂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永恒生命力。

（作者单位：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

清代苏州的端午与商业

钱宇轩

清中期的文人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品评道：“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三者鼎峙，不分轩轾。”今日以园林蜚声海内外的苏州在清代却以商业发达而为人称道，苏州的端午节庆也与商业息息相关。苏州碑刻博物馆收藏的几方工商经济碑刻详细记录了当时的节日盛况。

龙舟竞渡与苏州商人

说到端午，最为标志性的民俗无疑是龙舟竞渡。得益于发达的手工业、商业与服务业，明清时期苏州的龙舟竞渡在热闹程度上罕有其匹。成书于道光年间的顾禄《清嘉录》与袁学澜《吴郡岁华纪丽》，按时间先后分条记述了以苏州为中心的地区一年中的各种节俗，对于考察清代苏州的端午节俗颇有参考价值。

根据两书记载，龙舟竞渡在阊、胥两门，南、北两濠及枫桥西路水滨都有举办。龙舟平时沉入水中保存，竞渡前后取、存龙舟各有仪式。龙舟本身结构复杂，头部有亭，选端好小儿，装扮台阁故事；中舱伏鼓吹手，两旁划桨十六；船尾高丈许，牵彩绳，令小儿水嬉，类似今日的杂技或花样游泳。划龙舟时有“夺罐头”“打招”等竞赛形式，入夜还有“灯划龙船”。围绕着龙舟竞渡，商家、市民从五月初一就开始互相往来，名曰“拜客”，在划龙舟的塘河周围还会形成长达十天的临时集市，供买要货、食品之需。

苏州碑刻博物馆收藏有一方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许公馆捐款碑，因内容不全、位置偏僻，为人关注不多。但细读碑文内容，发现这很可能是某个商业团体参与龙舟竞渡形成的账单。现存碑文中反复提及取龙、修龙、扛龙、龙头皮帽、龙头皮靴、水龙筹、水龙旗等含有龙元素的事物和行为，又有款项涉及油衣、水靴、水桶等与水或防水有关的物品，还采购了锣、叫叫（哨子）、鞭炮、冲锋架子等营造紧张刺激氛围的物品，以及灯笼、蜡烛罩、插烛钉板、蜡烛、砌放蜡烛地坑等各项费用。据此可以得知，这是一项在夜间燃灯的活动，有龙元素，与水有关、有防水需求，竞速而热闹刺激。再与《清嘉录》《吴郡岁华纪丽》对读，该碑文是一份龙舟竞渡账单的可能性很大。

这份账单总额为142.5角小洋、226洋元、46484钱，在晚清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碑文中许公馆位置不详，任蒋桥、跨塘桥位置在今玄妙观与平江路历史文化街区之间，当时是苏州的丝织生产中心。结合《清嘉录》《吴郡岁华纪丽》的记载，猜测龙舟竞渡的背后离不开商业团体的支持与赞助，只是由于碑文的缺失，这方面信息已经无从查考。

端午香囊与苏州药店

端午时节，气候逐渐炎热，为防各种蛇虫瘟疫，古人很早就开始制备香囊随身佩戴，起到驱虫避瘟的效果。苏州府货运便利，服务业发达，又是吴门医派的中心，在调香制粉领域享有盛名，端午香囊也就销量大、讲究多。经过中医药行业的长期探索，端午香囊多用苍术、白芷、菖蒲、冰片等药材。苏州府也形成了各大药店在每年端午当天向市民广送苍术、白芷，供各家焚烧，以避秽祛湿的习俗。

分送药材本属好意，然而清代咸丰年间的苏州药店却因此惹上了麻烦。他们于咸丰四年（1854年）联名向苏州知府控告称：“有等不法之徒，届期来店，昼夜滋扰，强讨硬要。若不与伊，即肆蛮横。切思敬送药料原为好意，今反遭荼毒，实出情理之外。”请求官府出示禁令，以杜绝滋扰、保障正常经营。

清代中期以来，随着人口迅速增长，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区资源越发紧张。苏州府永禁各色人等在端午节向各药材铺强讨苍术白芷碑，记载了赴府控告的店家中不乏雷允上、沐泰山等知名店铺，连它们也不能幸免，侧面可见当时社会的物资匮乏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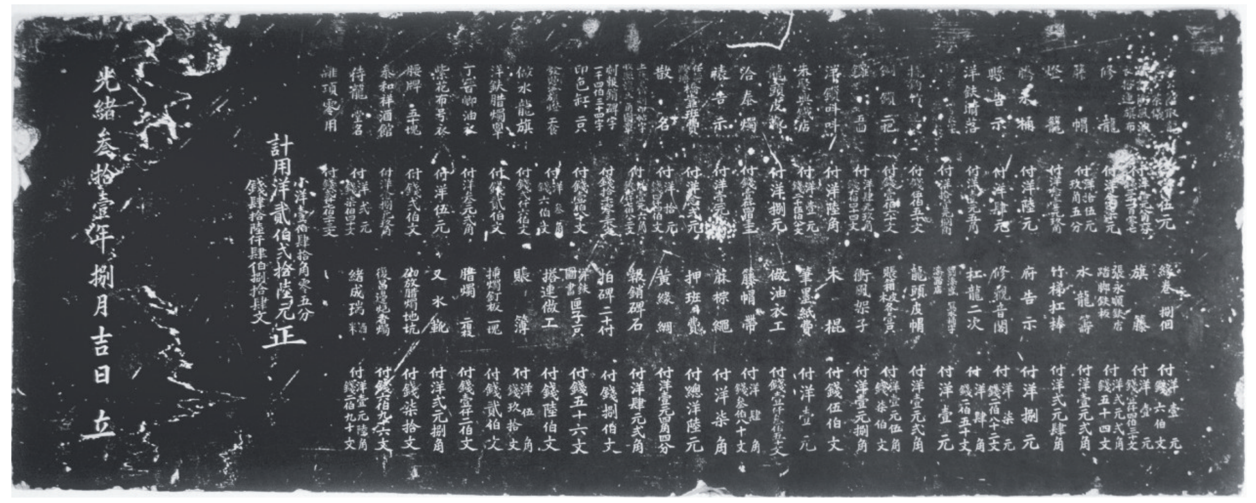
余绪：关帝诞辰

龙舟竞渡的金鼓之声已告消歇，以“划龙舟市”为代表的围绕端午的商业活动并不会立刻结束，因为紧随其后的就是农历五月十三——关帝诞辰。

苏州自明代以来，四方商贾辐辏，各自按籍贯形成同乡会，名为“会馆”；苏州城的各行各业又形成自己的行业协会，名为“公所”，苏州城中就有金华会馆、钱江会馆、镇扬公所等。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吴县永禁官占钱江会馆碑记载“……外供关帝，内奉文昌……”，清咸丰九年（1859年）吴县为七襄公所请官致祭给示碑记载“……设立七襄公所，供奉关圣帝君神像，每逢春秋二祭，应请官为致祭……”，关帝作为武财神与忠义的化身，受到各地商人的普遍崇拜与信奉，同时苏州城内不少行业都以关帝为行业神，如七襄公所、鲁班会、面业、理发业、油店业等。

在五月十三的正日之前，各行各帮已经杀牲、唱戏、举行灯会，开始祭拜仪式的筹备；到了关帝诞辰当天更要燃放爆竹，举行正式的祭拜，如此持续数日。就这样，关帝诞辰接棒端午节日的热闹，商业始终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节日因商业而热闹，商业因节日而发展，共同造就了“苏州以市肆胜”的美名。

（作者单位：苏州碑刻博物馆）


光绪叁拾壹年捌月吉日立
计用洋贰伯弍拾陆元正
许公馆捐款碑

粽香艾韵承古意 千年端阳续文脉

——天津博物馆馆藏文物里的端午民俗

崔凯欣

农历五月初五，榴花灼灼盛放，粽叶淡淡飘香。作为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历经两千余年岁月沉淀，端午早已不只是时节更迭的标记，更融合了缅怀先贤、祈福养生、民俗竞技等多重内涵，是弘扬民族精神和激发爱国情感的重要载体。

赛龙舟是端午极具代表性的民俗盛事，江河之上鼓乐齐鸣，各色龙舟破浪竞驰，两岸民众齐聚围观，一派热闹欢腾。这项水上竞技最初用以追思祭奠先贤，传承爱国精神，时至今日更诠释出团结协作、拼搏争先、永不言败的民族品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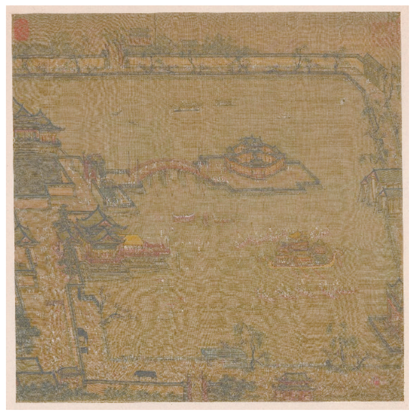


图1 宋代张择端《金明池争标图》

千年龙舟盛景，被历代文人笔墨、传世画作一一定格。南宋诗人杨万里目睹竞渡盛况，挥笔写下“急鼓繁钲动地呼，碧琉璃上两龙趋”，勾勒出双龙逐浪、人声鼎沸的鲜活场面，也道出初见竞渡奇观的满心赞叹。天津博物馆馆藏宋代张择端《金明池争标图》（图1），生动绘就了龙舟竞渡、争标、跳水、游泳、水战、水球、垂钓与水傀儡等水上运动。画作以大型龙舟为视觉中心，十余艘小型龙舟分列两旁，划手奋力挥桨，将士扬旗指挥，水上赛事角逐如火如荼。临水殿内君臣设宴观景，池岸民众游赏赶集，各色人物神态鲜活、惟妙惟肖。作品采用全景式构图，笔触精工细腻，画面构图完整饱满，叙事层次丰富。画作承袭并体现传统风俗画笔墨技法，真切还原北宋人文景致与市井民生百态。馆藏清代慎德堂款粉彩龙舟图瓷盖碗（图2），同样以器物承载民俗，温润瓷面之上龙舟纹样精巧生动，方寸之间留存端午竞渡风情，让传统民俗代代流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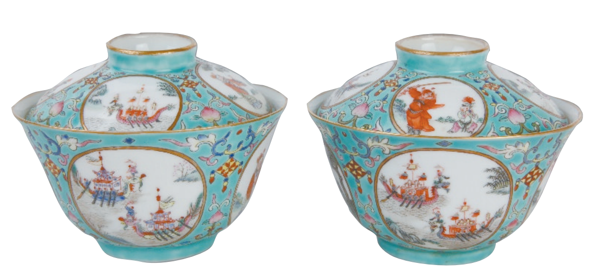


图2 清代慎德堂款粉彩龙舟图瓷盖碗

若龙舟竞渡是端午豪迈奔放的风骨，驱疫祈福习俗则蕴藏着古人顺应天时的东方养生智慧。端午临仲夏，气候日渐潮湿闷热，蚊虫病菌滋生，古时先民依托自然规律，摸索出防病健体的生活之道，衍生出各类护佑安康的习俗。在端午节挂艾悬蒲驱秽辟邪、系五彩绳祈佑平安、沐浴兰汤强身健体、饮雄黄酒驱邪解毒……一项项传统习俗是古人顺应节气、守护健康的生活智慧。馆藏清代钱慧安《鹿门采药图》（图3）描绘一位高士骑鹿行于山林之间，采撷草药，神情淡然，意趣幽远。画面设色淡雅，笔墨精细，契合端午采药祛病的民俗，亦通过“鹿门采药”典故传递不慕荣华，甘心隐居不仕之心境。馆藏清代边寿民《墨戏图》（图4）以水墨勾勒艾叶风姿，题词“艾叶充兰佩，菖蒲淬剑光；星精方闪烁，认得此芬芳。”点明悬艾佩蒲的节俗深意，是端午“驱秽辟邪”习俗的直接体现，文人借笔墨寄情风物，让端午的独特韵味绵延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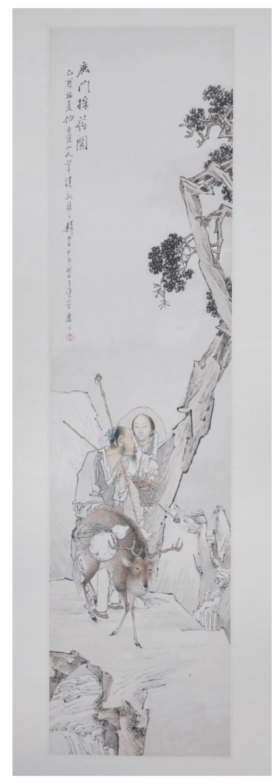


图3 清代钱慧安《鹿门采药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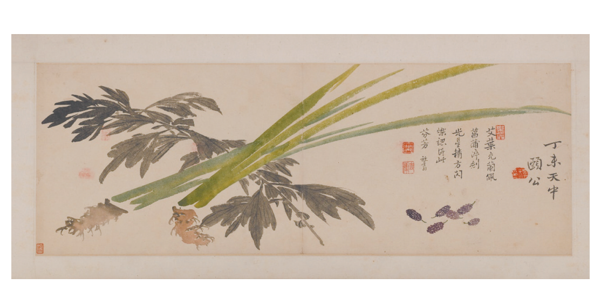


图4 清代边寿民《墨戏图》

千年端阳兼具竞技豪情、文人雅致，亦饱含市井烟火趣味。馆藏清代包栋《斗草图页》（图5），生动还原古时端午休闲玩乐场景。画中仕女围坐开展斗草游戏，比拼花草品类、吟草作对，意趣盎然。斗草分为文斗、武斗两类，文斗考验学识底蕴，武斗深受孩童喜爱。古人认为端午草木饱含天地灵气，斗草嬉戏既能陶冶心性，亦可祈福消灾，这幅画作尽显古人亲近自然、乐享生活的闲适心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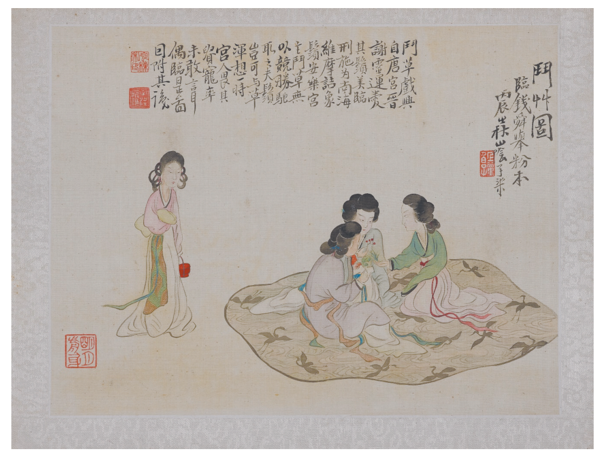


图5 清代包栋《斗草图页》

天津博物馆馆藏诸多端午题材古画也全方位展现了佳节风物民俗。清代朱本《端午图轴》（图6）以蜀葵、石榴、桃杏桑葚入画，蜀葵寓意驱毒，石榴象征吉祥多福，鲜果饱含安康顺遂之意，各类祥瑞花草瓜果相映成趣，勾勒端午时令美景，寄托福寿康宁的美好期许，笔墨灵动雅致，传递出文人对节令风物的诗意感知，将市井民俗的烟火气转化为清逸雅致的文人意趣，达到了“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清代戴椿所绘的《端午图轴》（图7）描绘了独具特色的端午风俗活动，包括饮菖蒲酒、捉蛤蟆、瓶供榴花蜀葵等。民间传说端午当日午时的蛤蟆毒性最强，此时捕捉可制取蟾酥，这是古代重要的药材，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的功效。北魏《齐民要术·杂记》中，有五月捉蛤蟆的记载，是古老的端午节俗之一。画作右上角配有题诗：“葵榴喷火艾敷香，彩线灵符斗巧妆；正是江南好风土，家家儿女作端阳。”既点明画作主旨，也凸显出浓郁的江南端午风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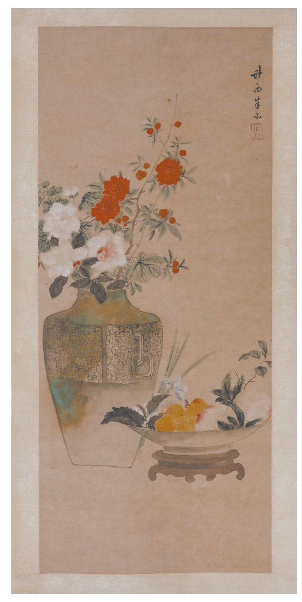


图6 清代朱本《端午图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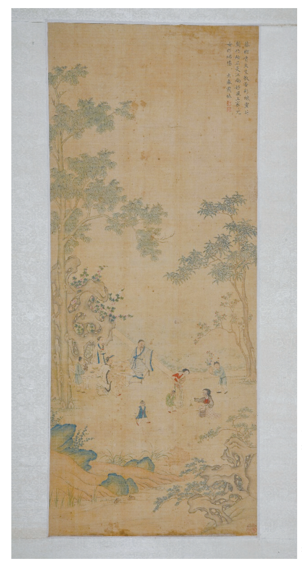


图7 清代戴椿《端午图轴》

如今，端午早已超越了单一节日符号，从古时追思先辈、祈福安康，到如今全民欢庆、文化传承，节日形式历经演变，不变的是团结奋进的民族气节、天人合一的东方智慧与热爱生活的赤诚本心。

（作者单位：天津博物馆）

方寸竞渡

——浅析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清象牙双面镂雕人物龙舟图扇

李其仁

长期以来，清代外销象牙扇的研究或侧重于工艺技法的梳理，或聚焦于贸易史与文化交流的宏观论述，而对特定纹饰题材和民俗传统之间关联的个案考察尚不多见。本文以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清象牙双面镂雕人物龙舟图扇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该扇是如何在方寸之间承载龙舟竞渡的文化叙事。

龙舟竞渡源流

关于端午节的起源，历代学者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有多种观点，其中以纪念屈原之说流传最广，影响最为深远。南朝吴均《续齐谐记》中载：“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亦载：“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并命舟楫以拯之。”

龙舟竞渡作为端午节最具标志性的民俗活动，其源流可追溯至更早的古越族水上传统。古越人依水而居，“陆事寡而水事众”，捕鱼捉虾之余常以竞划舟船为乐，由此产生了“竞渡”的原始形态。隋朝杜台卿在《玉烛宝典》中说：“南方民又竞渡，世谓屈沉汨罗之日，并楫拯之。”可见至隋唐之际，竞渡与屈原的关联已深入人心。到了唐代，龙舟竞渡习俗已十分盛行。唐代诗人张建封的《竞渡歌》描绘了当时壮观的竞渡场面：“……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虹蜺晕。前船抢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桡。疮眉血首争不定，输岸一朋心似烧。只将输赢分罚赏，两岸十舟五来往……”卢肇亦在《竞渡诗》中写道：“鼙鼓动时雷隐隐，兽头凌处雪微微。冲波突出人齐譀，跃浪争先鸟退飞。”一幅万人空巷、呐喊助威的端午盛景跃然纸上。北宋词人黄裳的《减字木兰花·竞渡》更是脍炙人口：“红旗高举，飞出深深杨柳渚。鼓击春雷，直破烟波远远回。欢声震地，惊退万人争战气。金碧楼西，衔得锦标第一归。”鼓声如春雷般炸响，龙舟从杨柳掩映的洲渚间飞驰而出，万人的欢呼声震动大地，黄裳以“鼓击春雷”的比喻，将端午竞渡的磅礴气势凝固在文字之中，令人读之如身临其境。至清代，岭南地区的龙舟竞渡已达到高度组织化与仪式化的程度。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八《舟语》专门记述广东龙舟形制：“龙舟长十余丈，高七八尺，龙髯去水二尺，额与项坐六七人，中有锦亭，坐倍之。旗者、盖者、钲鼓者，挥桡击楫者不下七八十人。竞渡则惊涛涌起，雷雨交驰，舟去而水痕久不能合，斯亦游观之至侈者。”清初陈恭尹的《龙船行》亦记载了广州龙舟竞渡的盛况：“金声号呶鼓声怒，百里刻期齐竞渡。”极具张力地描绘了号令一出，声震百里，千帆竞发的磅礴气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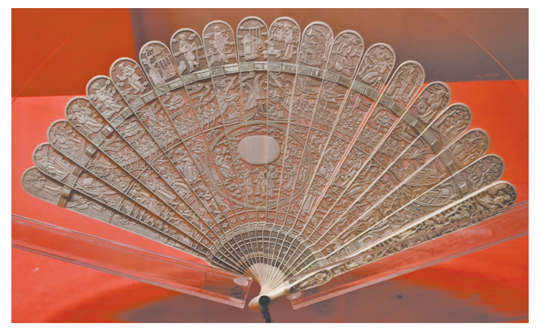


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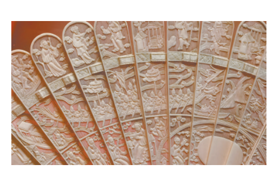


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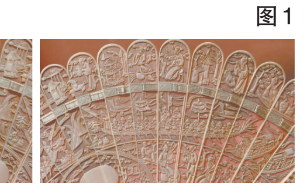


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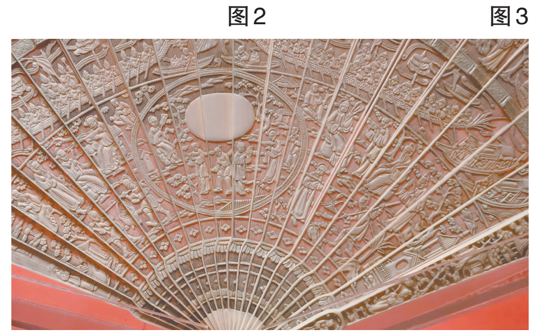


图4

清象牙双面镂雕人物龙舟图扇分析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清象牙双面镂雕人物龙舟图扇（图1），是清代广州外销牙雕工艺的典型作品。该扇以象牙为唯一材质，二十档，扇叶以丝带联系。大骨采用剔地浮雕技法雕刻庭院人物，扇面主体采用拉丝浅浮雕和双面镂雕技法。顶部饰庭院、人物，中部饰龙舟竞渡图与林间高士图，扇面中心椭圆形开光处有留白徽章。此扇雕工精巧、层次分明、繁而不乱。

此扇最精彩的部分莫过于中部的龙舟竞渡图与林间高士图。两组截然不同的画面在方寸之间从容展开，繁而有序、密而不乱，构成一动一静两幅画面。龙舟竞渡图（图2、图3）以人物众多、动作幅度大为主要特征。龙舟之上，桡手坐成一排挥动船桨，鼓手居中而立，双臂扬起的姿态生动形象，船头旗手挥旗向鼓手和划手传递指令。江面水纹以多条细密曲线刻出，使水面层次丰富而不破碎。龙舟之外错落分布着若干小型船只，船上人物意态闲适，目光皆投向画面中央的竞渡方向，将观者的注意力集中至竞渡的核心区域。

林间高士图（图4），这类题材在明清工艺美术中大量出现，从瓷器纹饰到漆器图案，从竹木雕刻到象牙制品，高士图始终是雅文化的视觉符号。龙舟竞渡图与林间高士图并置于同一把折扇上，一方面呈现世俗节庆的集体狂欢，另一方面又呈现文人理想的静态意境，完成了对“入世”和“出世”两种生命状态的表达。

外销语境中的端午文化传播

清代“一口通商”时期，广州是中国唯一对外贸易口岸，也是外销工艺品集中生产基地。十三行商馆汇集了大量工艺作坊，专为西方市场生产瓷器、漆器、银器、牙雕、绘画和外销扇。扇面中心留有椭圆形开光，供定制者刻写姓名或徽章，这一设计细节直接证明了该扇的外销定制属性。

黄海妍在《18—19世纪广州外销成扇概述》中提到，“从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初期的清代康熙年间，直到18世纪末年的嘉庆年间，从中国出口的折扇都以象牙材质为主，而且工艺精湛，成为名贵的礼品。”在欧洲的社交语境中，扇子是贵族女性不可或缺的随身配饰。在此背景下，来自中国的外销象牙折扇因其珍贵的材质、精湛的工艺和异域趣味的纹饰而备受青睐。值得注意的是，欧洲购买者对中国扇面上的龙舟竞渡图案或许不具备充分的文化认知，他们可能不了解屈原传说，也未亲历过端午竞渡的现场。然而，正是这种文化信息的“不对称传播”，使得龙舟形象以一种图像表达的形式进入了欧洲的视觉文化系统，这种经由外销商品完成的无意识文化传递，其文化传播效果未必弱于直接的文化输出，而是在日常使用中自然嵌入。

综上所述，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清象牙双面镂雕人物龙舟图扇，并非局限于单一的工艺史或民俗史范畴，而是将技术、节日民俗和贸易三个方面凝聚在一件器物之上，形成一个可供多维解读的物质载体。从技术维度看，该扇是清代广作牙雕复合技法的集中体现，牙丝铺地、双面镂雕、剔地浮雕技法协同运用。从民俗维度看，龙舟竞渡图的图式选择根植于岭南端午竞渡的深厚传统，从唐代的“两龙跃出浮水来”到清代的“龙舟长十余丈”，龙舟图像承载的是近千年的节俗记忆。从贸易维度看，该扇的外销定制属性使其成为端午文化跨海传播的实物载体，龙舟意象并非通过文字或宣讲进入西方视野，而是作为一件日常雅物融入欧洲社交生活中。

［作者单位：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

针线藏古韵 布扎聚同心

——云南民族博物馆藏布扎品鉴

程晓丹

端午节，又称端阳节、天中节、龙舟节等，承载祈福辟邪、欢庆娱乐、民俗饮食等多重内涵，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节日，赛龙舟、食粽子、佩香囊、饮雄黄酒等习俗世代沿袭。在云南大理剑川，佩戴布扎香包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端午习俗。白族布扎又称香包、香囊，以绸、缎、纱、绒、布等织物为原料，经剪样、刺绣、贴底、盘合、串珠、缝合等多道工序精工制作，内部装填艾叶、香料或五谷籽粒，造型涵盖瑞兽、生肖、花鸟、人物等诸多样式。作为云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项千年手工技艺留存着中原文化西南传播的历史印记，成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珍贵实物见证，彰显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独特魅力。

中原古俗南传与白族布扎的起源流变

剑川白族布扎与端午民俗密不可分，技艺文化本源可追溯至中原传统香囊佩饰文化。文献记载与民间民俗遗存相互印证，完整清晰地勾勒出这门传统技艺从中原腹地传播至滇西边陲，并逐步完成本土化演变的发展脉络。

中原端午香囊：布扎技艺的文化本源

端午佩戴香囊驱邪纳福源自中原，历史悠久。先秦至唐，已有将艾草、香料等缝入锦缎囊袋佩戴的习俗。《楚辞·离骚》载有“户服艾以盈要兮”，说明当时已有挂艾草的风俗。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瘟。”文中的“五彩丝”，正是后世布扎的雏形。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等文献典籍都记载了挂艾草、系五彩丝（布扎雏形）佩戴于胸前，以驱邪避瘟、祈求平安的习俗。宋代起，端午佩戴香囊习俗愈发兴盛，制作工艺融入刺绣、扎缝等技法，造型发展出生肖、瑞兽、花鸟等样式，形制不断丰富，相关习俗在《东京梦华录》《岁时广记》等典籍中多有佐证。

南传入滇：布扎技艺的本土化扎根

云南多个世居民族均有端午节佩戴布扎的习俗，据清乾隆年间的《开化府志·卷九》记载，彝族阿戛人“男女各佩锦布袋，斯须不离，惟疾病始解之”。锦布袋即为香包、布扎，表明清代中期佩戴布扎习俗已在云南民间普及。《剑川县志》同样翔实记载了当地端午民风民俗：孩童佩戴绣制狮、兔、金鱼、绣球、生肖等布扎饰品，造型精巧、香气馥郁。端午佩布扎香包的习俗已在云南民间扎根，并逐渐演化出地域特色鲜明的布扎技艺。

剑川地处滇西北，是汉、白、藏等多民族文化的交融地。明代大批中原军民南迁戍边、屯田定居，端午佩戴香囊的习俗随之传入剑川。中原移民与本地居民相融共处，就地取用本地艾叶、香草、麝香、雄黄等物产制作香包，既保留中原辟邪祈福的寓意，又适应当地环境需求，形成“驱虫佑体、驱邪避灾、祈福安康”的特色民俗。

明清以来，剑川白族布扎不断融合白族刺绣、木雕等本土传统工艺精髓，造型从简单香包逐步丰富为十二生肖、瑞兽花鸟、民俗典故等题材，兼具实用性与艺术价值，成为白族端午文化的标志性符号。2009年8月，剑川白族布扎被列入云南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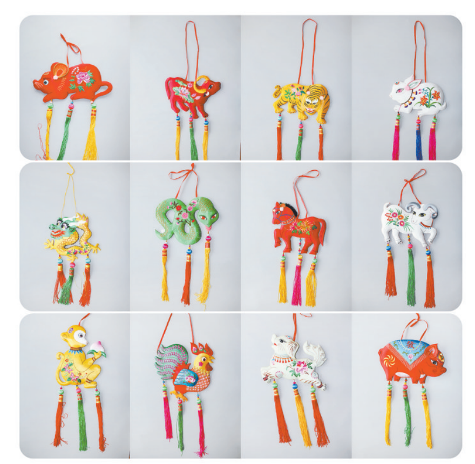


图1 十二生肖布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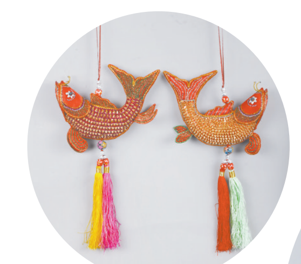


图2 鱼形布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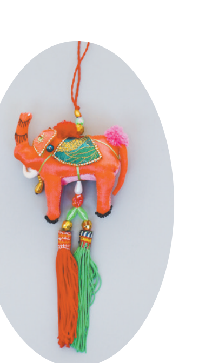


图3 大象布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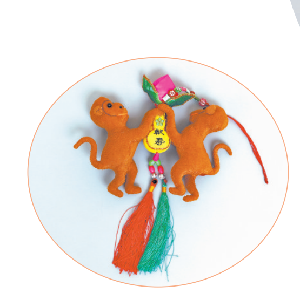


图4 金猴献寿布扎

白族布扎藏品的艺术特色与文化内涵

云南民族博物馆珍藏有剑川白族布扎一百余件，作品以十二生肖、金鱼、大象、金猴献寿等经典题材为主，造型灵动古朴、配色艳丽明快、工艺精巧细腻。这些馆藏布扎既是白族民间艺术的精品，更是中华民族文化共生的实物见证。馆藏张德和、赵怀珠、刘丽湖等资深传承人的布扎作品，题材丰富，是白族布扎馆藏的核心体系。馆藏布扎均采用“碎布取材、缝制成型、填香刺绣”的传统工艺。作品造型生动逼真、色彩对比鲜明，凝聚着白族手工艺人代代相传的匠心技艺。

十二生肖布扎：同根生肖凝聚共同文脉（图1）

十二生肖布扎为剑川白族布扎省级非遗传承人刘丽湖的代表作。匠人选用红、黄、白、绿等鲜亮绸缎，经剪样、刺绣、串珠、盘合等多重工序精心缝制，内里填充艾草为主的清香药材，端午佩戴可驱蚊避秽。十二生肖是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符号，深刻体现了各民族文化同源同根的精神联结。剑川白族生肖布扎恪守传统十二生肖排序与寓意，融入白族独特的审美特征，将民族刺绣技法融入制作工艺，生动展现各民族文化互学互鉴、融合发展的历史进程。

鱼形布扎：吉祥纹样寄托富足期许（图2）

鱼形布扎为云南省级非遗传承人赵怀珠制作。作品以红色为主色调，搭配鎏金鳞片与艳红鱼尾，黑色纽扣点缀鱼眼，体态立体鲜活。“鱼”谐音“余”，寓意年年有余、富贵吉祥。鱼形布扎沿袭中原吉祥文化内涵，成为端午祈福摆件，承载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品将传统吉祥符号与白族民俗生活文化相融，是各民族共享吉祥文化、共筑精神家园的生动体现。

大象布扎：瑞兽意象见证古道商贸（图3）

大象布扎由已故中国民族民间高级美术师张德和制作。作品经剪样、缀缝、滚边等传统工序精心缝制，橘色象身温润大气，蓝色鞍垫搭配金、橘色丝线绣饰纹样，料珠点睛灵动有神，尾部垂挂红绿相间线穗，内部装填传统香料，饱满立体。大象寓意“太平有象”“吉祥安康”，与端午祈福禳灾的节俗内核高度契合。云南作为大象重要栖息地，瑞象文化早已融入各民族生活。这件布扎融合中原祈福文化、白族刺绣工艺、瑞兽信仰，是端午习俗在边疆本土化发展的有力物证。

金猴献寿布扎：福寿文化彰显共同追求（图4）

金猴献寿布扎由省级非遗传承人赵怀珠制作。作品以棕色绒布塑造双猴捧桃的祝寿造型，内部填充艾叶、紫苏等，造型精巧生动。“猴”谐音“侯”，寓意前程顺遂、福禄相伴，寿桃象征长寿安康，将传统福寿文化与白族刺绣工艺相结合，寄托了中华民族对福寿双全的美好愿景。

剑川布扎蕴含民族交往交融印记

一针一线绣古今，一布一扎系同心。剑川白族布扎缘起于中原端午香囊，扎根于滇西北沃土，其技艺技法、造型题材、精神寓意都留存了民族互动印记，承载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珍贵历史记忆，蕴藏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精神基因。

明代中原移民南迁戍边，茶马古道商贸互通，为文化传播搭建了渠道。中原香囊技艺传入剑川后，在汉、白、藏、纳西等多民族交流中改良创新，吸纳多元文化元素，是民族交往的文化成果。布扎的纹样题材、制作工艺，融合了中原吉祥文化、滇西地域特色与白族审美风格，表现出各民族尊重差异、互鉴互融的文化特质。剑川布扎虽脱胎于中原端午古俗，但各族人民祈福平安的精神诉求是高度一致的，历经千年传承，这项技艺早已突破单一民族范畴，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财富。云南民族博物馆藏的布扎精品，是白族民间艺术瑰宝，更是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载体，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见证。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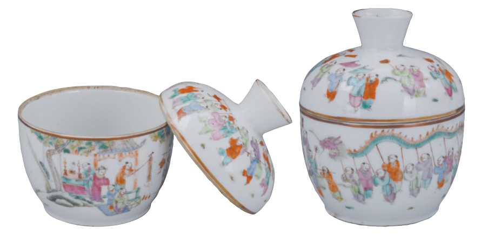
瓷上的端午气象

——萍乡博物馆藏清同治款粉彩儿童龙灯纹盖罐赏析

谢珂 邓里

舞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非遗传统民俗和体育运动，绵延千年而繁盛不衰，风靡民间，在端午节尤为盛行。关于舞龙的起源，民间有多种说法，典型的如黄帝与蚩尤大战涿鹿之野，蚩尤战败不得返巢，黄帝为纪念此战胜利而举行盛大仪式，即为“舞龙”之始。在文献中，最早的舞龙记载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求雨·卷十六》：“冬舞龙六日，祷于名山以助之。”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不仅记载了汉代四季祈雨仪式的特殊规定，也对四时舞龙的颜色有详细要求，如春青、夏赤、季夏黄、秋白、冬黑等，是汉代五行观念与龙崇拜、舞龙民俗结合的重要记载，同时也是早期舞龙的历史雏形。

江西萍乡博物馆馆藏清同治款粉彩儿童龙灯纹盖罐是晚清同治时期官窑出品的民俗彩瓷精品，同时也是集端午节俗、儿童游艺、传统体育文化于一体的珍贵文物。此罐器形圆浑饱满，胎质细腻，釉面温润莹白；口沿、盖钮与子母扣接处描金镶边，细节考究。罐底更以矾红书写“官窑内造”款识，是晚清官窑日用陈设的典型标识，体现了当时工匠艺人对官造工艺水平的追求，年代与品级皆考据清晰。


清同治款粉彩儿童龙灯纹盖罐

从画面构图看，这件器物疏密得当、叙事完整生动，一扫晚清部分彩瓷的粗陋之风。器物图案采用通景式满绘技法，画面层次连贯、童趣盎然。罐顶画面可见数十名孩童手执花灯、旌旗，奔走嬉戏，神态憨稚雀跃；罐壁画面一依次展现了童子们身着五彩衣装，热闹地进行舞龙仪式的三个场景，如燃放鞭炮、香案陈供，儿童欣然侧目，并有亭台、古木、山石点缀其间；画面二则展现出一幅稚童们手持花灯、执幡引路，吹唢呐、打鼓的热闹景象；画面三则由十个儿童合力擎举彩龙，身姿腾跃灵动，体态各异。整体画面首尾呼应，内容精妙绝伦，器物上的粉彩设色更是鲜丽柔和，冷暖配色明快协调，人物线条简练流畅，童子舞龙时天真烂漫的情态跃然瓷上。

关于古代儿童体育运动的肇始，我们也可在《礼记·内则》中发现一二：“十有三年，学乐，咏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至唐宋时期，儿童体育运动开始兴盛并走向成熟，基本完成了从礼制祭祀向民间游乐的转变，并成为中国古代儿童体育文化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核心阶段。如唐代的《开元天宝遗事》和宋代的《梦粱录》就分别收录记载了唐代宫廷孩童春日放风筝、荡秋千、竹马嬉游的盛况和宋代江南儿童日常的体育游戏与节令游乐习俗。这一时期的儿童体育运动体系完整、参与群体广泛、文化内涵深厚，既具有丰富古代孩童休闲生活、强身健体的实用价值，又承载着岁时民俗与家风教化的功能。明清时期，少儿游戏种类增多，从宫廷到民间、从城市到乡村，儿童体育游戏高度日常化、节令化、教育化，不仅玩法多样，而且规则成熟、群体性强。如童子蹴鞠、舞龙舞狮、踢毽子等，明万历晚期成书的《三才图会》就完整记载和展现了捶丸、蹴鞠、秋千、陀螺等儿童游戏图像，清代《养正书》则强调儿童要“晨起习武、游戏育体”的教育思想。因此，从目前发现的文物种类、画面和文献记载来看，宋代和清代是大量婴戏题材出现的高峰期。尤其是明清时期，把健身、游戏、民俗与教育融合在一起，其文献记载更是翔实可考、图像文物丰富，且记载的运动种类繁多，是中国古代儿童体育文化的高峰，也是今天传统体育进校园的重要源头。

端午舞龙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自身内核而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艺术形式和精神内涵。在萍乡博物馆馆藏的清同治款粉彩儿童龙灯纹盖罐上，我们看到了一场群体孩童集体协作舞龙、结伴巡游的游龙活动，这不仅是我国古代儿童传统体育文化的生动缩影，更鲜活还原了晚清民间端午的节庆场景与少儿休闲体育风貌。

这件盖罐于方寸瓷胎之上，定格了百年端午的民间烟火，岁月流转，它早已超越了普通日用盖罐的基本功用，为我们静静陈述趣味往事。以瓷为媒、以画为证，这件盖罐既为清代端午民俗、古代儿童体育游艺、晚清瓷业工艺研究提供了直观珍贵的实物史料，也为今人探寻传统节日文脉、重拾民俗文化记忆，留存了一件可赏、可读、可感的传世瑰宝。

（作者单位：萍乡博物馆）